

以文学陪伴守护成长

周敏

2018年,我的第一部以中学生为主人公的校园题材长篇小说《北京小孩》出版。作品聚焦初一新生这个在学生时代具有“承上启下”特点的群体,把因升学而给少年们带来的种种挑战放在首要位置,讲述少年们在应对压力的过程中重新完成一次自我认知,实现从小学生到中学生顺利过渡的故事。

2019年6月,北京潞河中学这所百年老校找到我,说学校初一年级学生正在阅读《北京小孩》。为了让学更好地理解作品,想请我到校讲一节课。时至今日,我仍然清晰地记得那场有六百多名初一年级师生共同倾听的讲座。从同学们热烈的掌声、真诚的笑脸和激动的发言中,以及那十几张精心绘制的学习小报中,我深深感受到他们对这本书的喜爱,感受到文学的魅力和生命力。讲座结束,孩子们意犹未尽,热情邀请我暑假结束后到他们班级体验生活,继续书写初二、初三年级中学生的故事。

当年晚些时候,我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我和我的6班》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几位主人公与《北京小孩》一脉相承,少年们的成长脉络清晰延续,被冠以《“北京小孩”姊妹篇》的名号。这本书的故事发生在初三时期,毕业班的喜怒哀乐成为主旋律。经过三年初中生活的“淬炼”,孩子们在面对来自学业、生活的考验时,鼓起勇气、坚定信念,抓住宝贵的成长机会,完成化茧成蝶般的“人格重建”,昂首走过毕业季,向着未来阔步前行。

在创作这两部小说过程中,我一直

秉持“深入生活”的宗旨,利用各种机会走访学校,和师生们进行深入交流。作品“人物画廊”的建立,跟几所学校息息相关,我从接触的学生、老师,以及接送孩子的家长那里,获取大量生动、鲜活的第一手素材。经过梳理、捏合,它们逐渐成形,被我加入这两部作品之中,参与故事的编排。小说人物的身上,都有现实中众多“6班”的影子,一个个典型事件背后也都有迹可循。

时间来到2020年。一个春日的午后,我收到北京潞河中学一位同学发来的短信:“周老师,您还写不写那本‘初二’的故事’?我们还等着看呢!”我先是一怔,随即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还欠着曾经读初一的她和她同龄人一部关于初二校园生活的小说。

为何写了初一的故事,就直接选择初三毕业班来写?现在想想,或许是因为当时素材的积累尚有欠缺,主人公的形象还未清晰。初中二年级,一个承上启下的学年;十四岁,一个如梦似幻的年纪,不应该就这样被错过。很多读者不喜欢这样的遗憾,希望我能补足“拼图”残缺的部分,还少年们一个完整的初中时代。

潞河中学小读者的催促,固然是创

作的初始动力之一,但也并非全部。平日里,在与许多年龄相仿的“大朋友”的聚会、闲谈中,免不了将各自在学生时代的种种奇闻逸事、所思所感作为谈资,或博开怀一笑,或得共鸣几分。其中,不少人都对初中生活记忆犹新,尤其是正值十四岁的初二时期,久远而神秘,在同样的年纪里,大家无一例外都亲手按下过正式拉开“青春大幕”的起始键。

尘封的回忆渐渐清晰,创作的冲动愈发强烈。在构思阶段,我决定仍选择前两部小说所处的那个年代,但我要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完全不同的班级。这样做,既可以保证这三部小说在时序上的紧密衔接,又能给将要创作的内容以更大的自由度,从人物到事件都基本上不需要顾虑前两部内容,写出的故事必将具备较高的独立性,便于单独阅读和欣赏,精彩度也可能更有保证。

创作的大原则确定下来,搜集素材、构思故事的工作逐步展开,经过几个月的沉淀、酝酿,主人公的形象变得清晰可见:一位从郊区小镇来到大城市的转学生,日日与醉酒的父亲相伴,思念着患病入院的母亲,找出“嗅青梅”的秘密,让母亲恢复记忆是他最大的愿望,尽管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奢望。陌生的环境,全新的挑战,这位十四岁的少年所要面对的,远远不止是“两点一线”的简单生活。十四岁所特有的冲动与烦恼,同样向这位少年袭来。异性的一举一动,在青春期透镜的放大作用下,

必将拨动他的心弦。

定好基本的调子,下一个问题同样重要——应该为他选个怎样的名字呢?说来也巧,有一天,我重温动画电影《飞天红猪侠》,其中讲到飞行员“红猪”和酒店女老板吉娜是青梅竹马的玩伴,还出现在两小无猜的少年时代,二人共乘飞机、翱翔蓝天的美丽画面。这不就是十四岁应该有的样子吗?于是,我当即决定,把“红猪”的本名——马可,送给我小说里这位十四岁的少年。

经过一段时间的写作,这部交织着失落与希望、挑战与勇气,更饱含着爱与真情的小升初稿完成了。要感谢本书的策划编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张引墨。她对少年情感的把控堪称精准,在保证刻画深度的前提下,力求突出纯、真、美,让十四岁应有的样子得到更为健康、更加充分和更具艺术性的展示。

正值花季的少男少女们,自然是《马可的十四岁》优先级最高的目标读者。我期待他们翻开这本书时,能够轻而易举地与马可和他的朋友们建立起牢固的情感链接,并逐渐体会到那一颗颗纯真的“少年之心”,与他们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放松,一起成长,一起品味虽有遗憾但仍旧美好的青春时光。我也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座桥”,在不同年龄段的人尤其是家长和孩子之间架起沟通的坦途,让他们的心能感受到相同的律动,从而贴得更近一点。

新媒介利于实现文学大众化

杨丹丹

当下,新媒介引发的文学生产方式、主体内容、传播方式和社交方式的转变,呈现出一种总体性特征。它既是当今社会数字化、资本化、市场化的结果,也是文学基于自身传统产生的现代性诉求的集中显现。所以,我们在阐释文学变革的新媒介机制时,要秉持文学的历史化与当代性并存且同行的总体性变革观念,发现当下文学的新趋向,发现文学新样态中蕴含的综合性、多层次性和动态性。那么,是否有一个统摄性话题,可以把这些古老和时尚的话题全部囊括起来,既可以看清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来路,也可以理顺文学变革的媒介脉络?

我认为“文学大众化”是较为恰当的话题之一。因为百年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文学大众化”讨论,而且都集中在“文学的大众主体”“文学的形式与内容”“文学的普及与提高”等关涉文学审美本体问题层面上。“文学大众化”具有总体性特征和统摄性特点。纸质媒介、影视媒介、网络媒介、社交媒体和数字媒介等都在影响“文学大众化”的发生和演变。因此“文学大众化”可以把文学变革的几种机制有效整合起来,发现当下文学现场的变量和常态。

新媒介的出现,让文学的主体发生深刻变化,创作不再是专属于“专业作家”的事。普通人如果有表达的欲望,有书写的基本素养,只要手持移动终端,注册新媒介账号,就可以进行文学创作。更为关键的是,文学作品主题、内容、人物和语言等,都由大众根据自身生活和情感经验完成。可以说,文学借助新媒介,表达大众的主体意识和普遍的切身感受,产生多种文学新样态。这些新媒介文学及其彰显出来的大众化特征,已然超出“文学大众化”经验的旧有框架。

当下,新媒介影响文学大众化发展进程呈现出几个明显特征。一是普遍性,即文学利用新媒介,使文学创作主体不再局限于某个特定群体,降低了文学创作的身份门槛,每个人都可以利用社交媒体进行文学创作。二是自发性,即文学通过新媒介,充分调动大众的创作积极性。三是常态性,即大众通过新媒介记录现实生活,成为每天必须完成的“规定动作”,文学创作成为常态。这些特征表明,文学借助新媒介重建了文学创作主体。在新媒介的加持下,大众的日常生活、情感体验和价值观念可以顺畅表达,也更容易受到关注,传播得更广泛,引发更强的共情。这些可能未经任何专业写作训练的大众,在新媒介中讲述家庭、工作、教育、医疗、养老等大家广为关心的话题。他们的写作真实呈现出普遍的生活经验、情感结构、价值观念和文化趋向。

借助新媒介,大众也真正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这与以往文学

大众主体的建构经验有明显区别。在数字媒介出现之前,大众成为文学主体的前提是,作家要首先调整和重建自身文化经验。赵树理之所以成为“文学大众化”的代表,是因为他长期浸润在乡村社会之中,有着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对农民的精神世界有着深入了解,能够发现乡村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充分利用地方文艺形式进行表述。换言之,赵树理在处理“文学大众化”问题时,他的知识分子身份及其现代思想,能够很顺畅地与乡村社会和农民世界结合。他通过改造传统地方戏曲,建构符合农民审美习惯的新的文艺形式。“文学大众化”所提出的“形式与内容”“普及与提高”问题,在赵树理的作品中实现高度统一、相互交融。这是他的作品被大众广泛接受的根本原因。

缺乏一线生活经验的作家对“形式和内容”问题的理解容易出现偏差。例如简单认为,只要把快板、鼓书、秧歌等大众文艺形式引入文学创作,就能赋予文学作品大众形式,或者认为只要讲述大众及其周边故事就是文学的大众化。这个过程中,形式与内容的契合度、内容对形式的改造,形式对内容的重构等问题被忽略,甚至被有意隐藏起来。这种割裂状态无法达成“文学大众化”的根本目的。而且这些想法和实践没有把“形式与内容”和“普及与提高”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对“文学大众化”的理解简单固定在文学通过何种形式进行普及和提高上。这使“形式与内容”“普及与提高”问题,降格为“文学大众化”的技术路线和审美形式问题。

在新媒介语境下,“形式与内容”“普及与提高”融合统一的问题得到颇为有效的解答。比如,不少读书视频博主在重要视频平台解读文学经典,不再集中在文学审美的专业分析上,而是从大众面临的现实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出发,以网友易于接受的方式,发现文学经典中能为普通人提供精神慰藉的资源。例如有的读书视频博主以动画、图片、思维导图的形式,解读《红楼梦》《百年孤独》《沙丘》等文学经典,并将其中的历史、故事和人物等审美要素,与现实社会问题关联起来。尤其是对《百年孤独》的详尽分析,消除普通网友阅读这部小说的专业障碍,让这部晦涩难懂的小说变得通俗易懂,而且让普通网友进入小说更深的精神世界,获得丰富的精神滋养。读书博主在新媒介平台解读中外作家的经典作品,网友跟随他们一起阅读、重新思考,从中寻找现实问题和自我情绪的对应物。

总之,在新媒介造就的文学语境中,以及文学不断趋向大众的情势下,文学既呈现出新的大众形式和内容,也丰富了新的大众传播方式,更能展现出符合大众精神诉求的思想意义。这是文学主动选择的结果,也是新媒介提供的历史机遇。



夏日读书兴味长

冀宣摄

书评

在数字化时代探寻人类的本真诉求 ——读石一枫《一日顶流》

张艳丽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为当下作家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与经验。石一枫的《一日顶流》(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互联网科技发展为背景,融入最新科技元素,用切近现实的选材、独出机杼的情节、鲜活的人物以及活泼风趣的语言,将科技知识与人文情怀熔于一炉,讲述了一个独属于数字化时代的故事。小说以胡学践、胡莘颐父子与互联网的关系为明线,将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穿插联结,勾勒出主人公意外成为网红后遭遇的心理危机以及自我疗愈过程,揭示出“人”作为生命体的本真需要及其价值实现路径。

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对胡莘颐“怕”“管”“爱”的心理呈现,首先是“怕”。他的“怕”来自一场机械事故。母亲的惨死促使其选择性失忆,母亲墓地“杨树上的眼睛”令他恐惧,后来延伸到怕“千年虫”、怕被人看、怕没人管……于是,5岁的胡莘颐“爱”上了6岁的李蓓蓓——有姐姐“管”,他才不怕。这种“管”被他理解为“爱”,即使李蓓蓓失联多年,他依然坚持寻找。对“爱”的执着不仅源于母爱的缺失,也出于他对“怕”的逃避。当接替李蓓蓓的李贝贝出现,他暂时忘了“怕”。而当李贝贝离开时,胡莘颐声嘶力竭地喊出:“谁来管管我!”其中蕴藏着他在20多年来对“怕”的恐慌,也是他作为一个生命体最本真的诉求与呐喊。犹如《狂人日记》中的

“救救孩子”,当他发现热闹的现实世界背后的荒凉本相,心理上的生命需要使其本能地发出呼救。由此,直播中一句“谁来管管我”的呼喊与无可依附的现代人的情绪产生了共鸣,胡莘颐在互联网上意外爆红,成为网红“求管哥”。成为“顶流”后,众人的目光犹如杨树的眼睛让胡莘颐害怕,在对“怕”的逃离与对“爱”的找寻中,他开始了自我疗愈。人工智能慧性的出现使其无处逃生,得到心理安慰。终于,胡莘颐以对李蓓蓓的爱为钥匙,以慧行的情感慰藉为动力,击碎了“怕”。

在“怕”“管”“爱”的心理变化中,胡莘颐这个人物形象逐渐丰满立体。作家将他比作“流浪的二傻子”,赞赏其天真、纯良的傻劲儿。正如鲁迅笔下的狂人一样,他们忠实于本心,执着于对生命本相的探索并勇于发声。石一枫借此表达了他的忧思:“面对未来,人类愈发乏力,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傻子为这个物种的价值划定了最后一条护城河;做个人吧,起码别让机器比我们更像人。”这句话一语道出其创作归旨。小说的故事虽穿着科技外衣,内里却是作家对人类生命走向的隐忧与探索。在虚拟世界不断膨胀的当下,人最本真的需要是什么?如何在追求流量变现的资本逻辑中保持“人”的清醒?这是现代人需要面对的时代命题。作为生命体,最终满足人类需要的恐怕不是丰富的物质、高深的思想与算

法模拟出的情感,乃是内心的充盈与满足。在渺不可知的未来面前,人唯有守住作为生命体的本真需要,才能不被科技洪流所裹挟。

就此而言,《一日顶流》更像一个寓言,探讨严肃的哲学命题:人类未来走向及生命价值何在?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使我们必须回归“生命”本身。就生物学而言,生命是“具有特殊结构且比较稳定的大分子物质”,人的生命意义即“人类的存在、生育儿女、满足自身需要”。因此,生命的本质是一种需要,生命存在的意义在于满足其需要。就社会学而言,“人”更是一种精神存在,因此,“通过延长‘物质生命’而追求‘精神生命’的永存,才是生命的质量和意义所在”。若把物质生命称为外部生命,精神生命则可称为内在生命,而文学意义上的生命意识便是对人内在生命需要的表达与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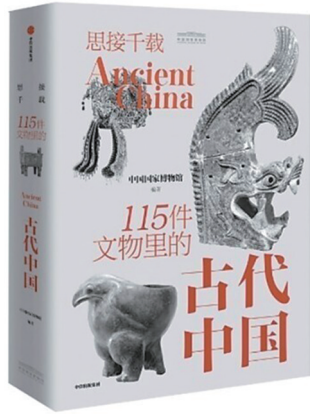
石一枫在小说中着力刻画的,便是这种关注内在生命的人物形象。这类人看似有点傻,实则活得认真。以胡学践父子为例,机械事故使胡学践由技术工人变成了足不出户的网民,从Intel486用户到攒机高手,他发现了间接导致妻子意外身故的黑客“老神”,却原谅他并鼓励其重新做人;明明对李蓓蓓的母亲动了情却担心拖累对方而婉拒爱情;日常花费极少,却对“北漂”李贝贝倾囊相助。这是一个不计个人得失却心胸广阔

的人。胡莘颐也是如此。在李贝贝眼中,他有些“彪”;在发小马大合那里,他是任人可欺的滥好人。内在生命的渴望使其对外部世界的需求极低,而对爱与理解的内在需要却异于常人。5岁宣布“爱”却真诚而郑重地“爱”到了28岁,这23年的心路历程便是其内在生命意识发展的过程。《一日顶流》摄取人物不断向内认识自我的心灵图景,塑造出真诚、纯良而又仗义的人物形象,并赋予其互联网带来的伤痕与梦想,探索人如何在数字化时代完成“人”的成长,以不可替代的生命存在走向未来。

作为一名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作家,石一枫擅长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社会问题并指出其症结。以社会热点为思考的触发点,以人文关怀为底蕴,以艺术性、趣味性、专业性相结合的故事为载体,构成了石一枫鲜明的创作特色。他在轻松诙谐中探讨严肃的社会问题,从以游戏电竞为题材的《入魂枪》,到反思教育问题的《逍遥仙儿》,再到探索人与网络关系的《一日顶流》,石一枫在意味深长的故事中塑造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启发人们在热闹中保持冷静的思考。尤其是《一日顶流》中对最新科技的文学想象,对生命价值的探索,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与现实意义,显示出作家具有前瞻性的文学创造力,也展现出他作为当下“新北京作家群”代表的实力与潜能。

荐读

感受文明不息的脉动



为了帮你更好地读懂“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把国博最受瞩目的展览带回家,2025年“5·

18国际博物馆日”之际,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中信出版集团联袂推出《思接千载:115件文物里的古代中国》。本书从“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中精选出115件珍品,由拥有丰富讲解工作经验的国家博物馆社教专业人员倾力编写,20余位知名学者严格论证审核,与你分享那些祖先留给我们的记忆和荣光。透过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你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更好地读懂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更好地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的古老追问。